



香港亞太研究所

「一九七二架構」的鬆動解體 與北京的對策

王家英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15.00
ISBN 962-441-106-9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一九七二架構」的鬆動解體與 北京的對策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一九七二架構」的鬆動解體與 北京的對策

引言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分形定勢：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打敗國民黨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但國民黨並未被徹底消滅，而是敗退台灣，並在美國的軍事支持下維持中華民國政權。自此之後，國共一直在台灣海峽兩岸維持分立對峙之勢，迄今未變。在對峙早期，雙方均企圖以武力手段解決對方：北京強調「解放台灣」，台北則堅持「反攻大陸」。但七十年代初以後，由於冷戰的緩和及北京成功取代台北在聯合國的席位，北京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日趨鞏固，開始轉向尋求以和平方式解決與台灣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台北也因實力的強弱懸殊，漸放棄「反攻大陸」的夢想而專注於內政的建設，偏安台灣。

八十年代初，北京正式制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政策基調，並積極推動兩岸經貿和民間互動，其後台灣也逐步放寬對大陸的探親、旅遊、投資等，兩岸經貿關係因此而出現蓬勃的發展，影響所及，兩岸過去數十年的政治和軍事對抗似乎也在北京「和平統一」的口號下有轉趨緩和之勢。然而，進入九十年代，事實證明兩岸的政治分歧不僅並沒有因兩地的經貿匯合而縮窄，反而進一步擴大。最明顯的發展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台灣總統李登輝獲准訪美，被北京判

© 王家英 2000

ISBN 962-441-106-9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斷為台北分裂祖國踏出的重要一步，並回應以連串的「文攻武嚇」行動，使台海出現二十多年來罕見的軍事對抗危機。儘管有關危機因美國派出尼米茲號和獨立號兩組航空武艦群至台灣海峽附近進行「監控」而終於暫時消散，但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台北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簡稱「兩國論」）定位兩岸關係後，北京再次對台作出新一波「文攻武嚇」行動以為還擊，使得剛從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機走出來不久、漸次趨於和緩的兩岸關係，又即時處於異常緊張對抗的僵局之中。有論者甚至認為，經過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機和「兩國論」的衝擊之後，北京已越來越認定台北在分裂祖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故此已決心調整其對台政策，特別是從過去對「和平統一」的強調，轉移至「以武防獨」，甚至是「以武促統」的方向傾斜。¹

究竟北京是否真的正在調整其對台政策呢？若然是，甚麼原因促使其對台政策的調整？調整的方向為何？本文旨在嘗試回答上述的一些問題。本文指出，出於民族主義、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的考慮，北京的對台政策相當一貫地以統一台灣為其基本訴求。不過，受到更高戰略需要和美國因素的驅動，北京與華盛頓在七十年代取得相互的妥協，一個過渡性台海和平架構——「一九七二架構」——於焉誕生。這架構建基於兩個當時中美台三方均能暫時接受的原則：「一個中國」原則與和平原則，並成為北京七十年代以後和平統一台灣的政策框架。「一九七二架構」的出現維持了台海和平達二十年之久。但進入八十年代之後，由於兩岸關係及國際政治的一系列變遷，有關的架構開始面對不斷上升的調整壓力。當中最具挑戰性的當為八十年代中以後台灣的急速民主化，後者使台灣對追求分離於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自主性／獨立的欲望日益高漲。而北京則視此追求為台北對

「一個中國」原則的背棄，因此以「武嚇」作為回應，從而重燃了兩岸的戰爭遊戲，甚至有將美國捲入的可能，因為華盛頓對台有安全承諾。結果是不僅「一九七二架構」的和平原則受到威脅，整個和平架構也被推向解體的邊緣。本文認為，有鑒於「一九七二架構」已無法應付新的兩岸現實，北京與台北必須尋求新的妥協架構，穩定兩岸關係，以避免兩岸走向戰爭。

現在先讓我們對北京為何堅持兩岸統一的立場作一個基本的瞭解。

北京對統一台灣的三個考慮

在兩岸半個世紀的持續對峙中，較少人爭論的一個共識是，北京對統一台灣的立場相當認真、相當執著，較多爭議、也時有轉變的，應只是其統一台灣的手段（策略）和形式而已。究竟甚麼原因使得北京對統一台灣有強烈的執著呢？答案離不開下面三個：

（一）民族主義。這也是北京一貫強調的觀點。其主要內涵是中國近代經歷了世界列強欺凌的苦難，而台灣也是因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而丟失的，兩岸四九年以後的持續分裂，很大程度上也受制於國際強權特別是美國因素，故此重建大一統的中國，包括推動香港、澳門的回歸和兩岸的統一，便成為民族復興、民族自強的基本的前提與信念。² 這樣的信念，不僅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共產黨歷任領導人如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也同時深刻影響到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領導人如蔣介石父子。這正是八十年代末以前兩岸之爭主要集中在中國代表權之爭而非兩岸主權衝突／分割之爭的根本原因。³ 尤須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由於共產主義意

識形態受到新興的市場經濟的嚴重腐蝕而快速殒落，以大一統的光榮和民族的復興為號召的中國民族主義，輕易地取代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民間的支配地位，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人民的重要手段，從而進一步加強了民族主義在北京對台政策上的地位與影響。

（二）政權穩定。大一統中國民族主義的認定雖一方面提供了中國領導人在後共產主義時代團結人民的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們調整對台政策的空間。如果大一統中國如中國領導人所宣傳一樣，是全體中國人民必須達成的民族神聖任務，任何中國領導人若然輕率地放棄統一台灣的目標，必然會受到人民的批評或政敵的攻擊，其領導中國的合法性也會因此而受到動搖。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便不只一次說過，只要他坐在國家最高領導人位子上一天，就絕不容許國家分裂；別的人坐在這位子上，也是一樣。⁴

（三）國家安全。這裡所指的國家安全包含兩方面，一是台灣獨立對中國維繫國家疆土完整的衝擊，另一是台灣對中國地緣政治經濟的重要性。⁵ 首先，眾所周知，中國西北及西南部均存有不同程度的少數民族民族主義運動問題，對中國維持對這些地區的領土主權的宣稱一直構成威脅。從北京領導人的角度看，如果中國容許台灣獨立，勢必削弱其對這些少數民族地區擁有主權的理據，甚至會對這些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產生正面的示範和刺激作用。⁶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台灣扼中國東南門戶之要衝，對中國有異常重要的戰略重要性，這正是過去數百年來列強環視爭奪台灣的主要原因。在利益爭鬥仍然支配國際關係發展的大環境下，縱使中國領導人能擺脫民族主義情感和政權穩定因素的羈纏，考慮到台灣的現實戰略重要性，相信在現階段亦極難從容讓台灣邁向獨立，因為從消極的角度看，獨立後的台灣或與中

國為敵，或落入列強（如美、日）控制之中，中國東南部的安全便會受到極大的威脅。⁷ 再者，從積極的態度出發，隨著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下綜合國力的持續上升，中國領導人的大國意識越來越強，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也相應展現出更積極的雄圖規劃，這益加強了其統一台灣的自信。與此同時，台灣既扼中國東南門戶的要衝，也是中國朝向亞太地區發展的重要樞紐，就地緣經濟的角度而言，中國欲將之納入其控制之下，自乃合乎中國國家利益的順理成章之事。⁸ 事實上，不少學者也指出，控制台灣已成為中國「崛起」時期從傳統內向、防禦性的安全戰略，轉向較具有外向、擴張性的安全戰略的必然邏輯。⁹ 正是出於同樣的外向、擴張性的安全戰略邏輯，中國對蘊藏豐富海洋資源和石油資源的南沙群島、釣魚台群島，也一貫堅持擁有主權，絕不放棄。對這些主權地位相對模糊的荒島中國尚且採取如此堅定的立場，對地位相對明確的台灣（國際社會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並沒有太多的質疑），便更難期望中國隨便有所鬆動了。

上述三方原因究竟哪一個在北京堅持統一台灣的立場上發揮較重要的影響並不容易也未必能夠分判清楚，而且當中也存在著時移勢易的變數，但我們大抵還是可以這樣說，這三方原因的併合互動，使得北京領導人認定，儘管和平統一台灣任務艱巨，但讓台灣和平分裂更勢難接受，而在後者的思維限定下，當他們感到和平統一的政策無以為繼時，武力便可能成為無法迴避的考慮手段了。這是探討北京對台政策的可能轉變時必須注意的。

維繫台海相對和平的架構：「一九七二架構」

當然，北京有統一台灣的強烈意願並不等於它有統一台灣的能力，而眾所周知，自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之後，台灣

便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之下，甚至在一九七八年底美台斷交之後，美國隨即制定《台灣關係法》，對台灣的安全繼續作出某種形式的承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中美台三方均不滿意、但都暫時可以接受的維繫台海相對和平的架構在一九七二年開始出現，並於一九七九年大致構築完成，而構築的基礎就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美兩國先後共同發表的《上海公報》和《中美建交公報》，以及一九七九年四月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¹⁰ 我們姑且稱這和平架構為「一九七二架構」。扼要而言，架起「一九七二架構」的支柱有二：

（一）美國認識到在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

（二）美國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上海公報》）；美國之政策為：……（3）明白表示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完全是基於台灣的未來將以和平方式決定之；（4）任何試圖以和平手段以外之方式，包括經濟抵制或禁運，決定台灣之未來，將被認為乃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之一項威脅，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5）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6）維持美國之能力以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台灣人民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之武力行使或其他形式之強制行動（《台灣關係法》）。

對中國領導人而言，上述架構最令他們不滿意的地方毫無疑問地是其第二根支柱，即美國堅持了兩岸和平解決彼此政治紛爭的期望和對台灣安全的承諾，這使得美國保留了一旦中國選擇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時它可以介入的理據和空間。¹¹ 但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還是默認了（或起碼沒有嚴重挑戰到）有關的架構，主要原因應包括：

（一）美國已認同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並在《中美建交公報》中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兩岸的外交戰上北京認為已贏得最重要的勝利，並有信心在未來逐步迫使美國完全放棄對台的安全承諾。¹²

（二）台北當時也認同一個中國，並在國際社會繼續堅持與北京「漢賊不兩立」的立場，紓緩了北京對台北尋求兩岸永久分裂的憂慮。

（三）在兩岸中國代表權之爭上，北京有信心完全壓服台灣。也就是說，北京認為時間對它有利，故此可讓台灣問題的解決再拖一些時日。

（四）中國需要美國抗衡蘇聯之心絕不亞於美國之需要中國，中國願意為此妥協，暫時接納美國對兩岸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紛爭的堅持。¹³

值得注意的是，在默認「一九七二架構」的同時，北京從沒有向美國承諾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而當它在八十年代初制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政策基調之後，更清楚規定出其對台動武的兩個前提：台灣獨立和外國勢力干預台海事務。¹⁴ 明顯地，北京默認「一九七二架構」的基礎是美國和台灣對「一個中國」的認同，如果這基礎受到破壞，這架構也就不復存在了，而到時北京便必須以其設定的方式——包括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這可以說是北京維持和保障「一九七二架構」有效地繼續運作的關鍵。換言之，對北京而言，「武嚇」一直是「一九七二架構」的內置機制，儘管美國未必認同。

對當時在台灣中華民國而言，它固然不可能也不願意公開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全中國的說法，但它還是認同「一個中國」——儘管它所堅持的「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

國。再者，礙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於國際社會的現實（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和美國的轉向，它對上述架構已無太多討價還價的能力，美國能在承認北京政府的同時，堅持中國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並對台灣的安全繼續作出承諾，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至於美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大相對於中華民國之小的極端不對稱性，再加上中國對美國抗衡蘇聯的戰略重要性，承認並維持與中國的正常關係，絕對符合美國利益。只是美國在台灣也有相當的經濟以至戰略利益，美國並不願意僅爲了顧及中國的重要性而將台灣拱手送給中國，故此堅持北京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便成爲美國必須向北京設定的、平衡台海利益的重要槓桿。¹⁵

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約二十年間台海能夠維持相對和平的關係，大體上便是「一九七二架構」發揮了穩定作用有以致之，而關鍵則是一方面美台雙方均沒有對此架構的「一個中國」支柱作出嚴重挑戰，另一方面中國也沒有試圖單方面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一九七二架構」的鬆動瓦解

然而，必須指出，「一九七二架構」只是一個由中美台三方暫時妥協而產生的過渡性架構，它並沒有替兩岸如何解決彼此之間的紛爭提供任何終極的答案或安排。換言之，只要兩岸任何一方不再願意繼續彼此之間矛盾不明的關係而思以突破時，這過渡性架構便即時面臨鬆動解體的命運。另一方面，所謂九十年代初以前中美台三方均沒有對「一九七二架構」作出嚴重的挑戰也只是一相對的、粗略的說法，而實質是在這期間，兩岸關係和國際形勢均出現了深刻的變化，

使得七十年代建立的「一九七二架構」，越到後來越難支撐下去。這些變化包括：

（一）在一九七九年北京推行開放改革政策和一九八七年台北宣佈解嚴並陸續向中國大陸開放探親、旅遊和投資之後，兩岸開始從過去的經濟隔絕走向蓬勃互動，經貿和民間往來不斷加快、加深。如前所說，在八十年代初，北京更制定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政策方針，力圖以北京爲中央、台灣爲地方的統一模式爲藍本，配以經濟吸納台灣的政策，推動兩岸邁向統一。¹⁶結果是，兩岸經貿的快速成長一方面爲台灣經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會，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意識形態迷思不攻自破；更爲重要的是，在北京堅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配以經濟吸納台灣的策略指導下，「一九七二架構」未有解決的兩岸關係定位問題，即時受到壓力而出現變動。這些發展，均迫使台灣極思尋求一個與中國有清晰區隔的政治定位，以爲安全的屏障。

（二）與此同時，八十年代中開始，台灣迅速邁向民主化。這轉變使台灣的政治出現數方重大的變化，兩岸關係也因而加速複雜化：（1）中華民國中央政權漸次完成在台灣的全體普選，如果國家的主權乃來自人民，全面普選後的中華民國主權勢必正式從其憲法所宣稱的涵括全中國退縮至中華民國在台灣。¹⁷（2）隨著民主政治的開展，對台灣前途的討論不再成爲政治禁忌，結果是不僅強調台灣政治自主性的人數迅速上升，公開追求台灣獨立的民進黨也持續在中央級的選舉中取得約三分之一的台灣民衆的支持。¹⁸（3）在國家基礎轉變、政黨政治和民意的多重壓力下，加上上面第一點所論及的壓力，執政國民黨開始放棄與北京的中國代表權之爭，改而追求兩岸關係上的雙互承認和國際社會上的平衡代

表，兩岸之爭正式從中國代表權之爭步向中國主權衝突／分割之爭。¹⁹

（三）中國大陸在八十年代以後的經濟崛起，帶來了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上升，兩岸實力的不對稱性不斷擴大，北京利用這機會加速其對台灣的外交圍堵，使得台北與北京的中國代表權之爭更顯得沒有出路，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台北對台灣政治自主性的尋求。

（四）八十年代末蘇東共產主義的崩潰和八九年中國大陸爆發的天安門慘劇，不僅使中國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大幅消減，而且更使中國的威權政治本質暴露無遺，相形之下，台灣新興的民主政治和日趨成熟的市場經濟便越見可貴。影響所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開始調整對華政策，台灣的地位重新得到更多的重視，而台灣也視此為突破北京國際封殺的契機。²⁰

上述的變化對「一九七二架構」構成強大的衝擊。首先，中國的經濟崛起強化了其以「一國兩制」模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對台灣形成巨大的政治壓力。另一方面，台灣的民主政治建構漸次完成，經濟也持續發展，政治自主意識快速升高，對來自北京的壓力的回應並不是向北京設定的「一國兩制」屈服，而是尋求與北京對等的政治自主甚至是主權分離的地位。然而，有關的尋求並沒有得到北京的認同，北京反而認為此乃台北對「一九七二架構」的首要支柱——「一個中國」原則——的挑戰與否定，從而引發了兩岸「統」與「獨」的惡性政治競爭。而國際社會提升對台灣的重視，更增添了北京的疑慮，認為國際反華勢力與台獨勢力有合流之勢，北京因此按照其設定的「修復機制」對台訴諸「武嚇」行動，也借此警告國際社會，直接衝擊到「一九七二架構」的另一根支柱：台灣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由

於美國在「一九七二架構」中曾作出對台安全承諾，使得由北京「武嚇」挑動的兩岸可能軍事衝突，隨時可能因美國的介入而演變為中美軍事衝突，整個「一九七二架構」也因此而面臨全面鬆動解體的危機。

北京對「一九七二架構」鬆動解體的回應

現在要思考的是，武力是否已成為北京回應「一九七二架構」鬆動解體的主導原則？更確切的問，北京究竟採取甚麼樣的一種策略回應「一九七二架構」的鬆動解體？目標又是甚麼？

顯而易見，「一九七二架構」的鬆動解體起因於北京將台北九十年代初以來連串的外交和大陸政策變動判定為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否定，並採取其認定的「修復機制」——「武嚇」——迫使台北回到「一個中國」原則的方向去。就這一點而言，「武嚇」應只是北京試圖修復「一九七二架構」的手段，未必代表它已正式從「和平統一」轉向「以武促統」。

事實上，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機的爆發，也是北京「武嚇」台灣而出現的，當時北京大體認定台灣總統李登輝訪美是台北尋求「和平分裂」的表面化和美國刻意包容（國際干預）的結果，故此以「武嚇」的方式警告美國和迫使台灣從「和平分裂」回到「和平統一」的方向。²¹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九五／九六年台海危機消散之後，北京對台政策明顯還是以「和平統一」為主要基調，一方面以大國外交方式力圖重構和鞏固中美關係，藉中美關係的重構和鞏固堵塞台北尋求政治自主性的國際空間；²²另一方面繼續就兩岸「三通」和政治談判向台北施壓，迫使台北與其就統一問題進行談判。

顯然地，「武嚇」是北京認為當其「一個中國」原則受到挑戰後必須發出的嚴重警告，但「武嚇」過後，特別北京認為「武嚇」作為遏止「台獨」發展的手段收效後，它似乎還是偏向以和平途徑解決兩岸的政治紛爭。這樣的政策思維，在台北推出「兩國論」定位兩岸關係後，也未見有重大改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週年國慶典禮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對台政策上所強調的，還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²³同年十月稍後，江氏在接受英國《泰晤士報》書面訪問中，被問到中國改革的主要目標是甚麼時，他如此回答：「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是，到下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在同一問答最後末段巧妙地提及：「我們將繼續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在順利實現香港、澳門回歸以後，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²⁴江氏有關的訪問講話，被台灣方面廣泛地解讀為北京未來五十年最高戰略發展目標為實現全面現代化，統一台灣將俟諸中國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後期；「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仍是北京當前對台政策的主導原則。²⁵在二零零零年元旦的公開講話中，江氏再次重申：「我們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沒有改變」，儘管他同時批評台北推出的「所謂『兩國論』遭到了海內外一切愛國同胞的強烈譴責。」²⁶

問題是，所謂台灣方面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挑戰或否定，畢竟只是北京單方面的主觀判斷或詮釋，而「武嚇」與真正的軍事攻台很多時候也只是一線之差。故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問，甚麼樣的「一個中國」原則底線才是北京認為不可逾越的底線，而一經逾越，將會導致北京從「武嚇」躍向軍事攻台？

若以前述北京對統一台灣的三個考慮作思考基礎，目前而言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底線應還是止於台北公開宣佈完全分離於中國大陸的獨立，並取得國際強權如美日的支持。一九九九年九月江澤民與克林頓在新西蘭會晤時，對此底線也有重申，未見變化。²⁷在二零零零年的元旦講話中，江氏在批評了台北的「兩國論」之後，也只含糊地表示：「為了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對任何分裂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進行所謂『台灣獨立』、損害兩岸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嚴重分裂活動，我們絕不會坐視不管。」²⁸就這一角度看，台北早前提出的「兩國論」，充其量只離北京的底線不遠，未必已逾越北京的底線，故此北京才會作出連番的「武嚇」行動以為警告。但既然是「武嚇」而不是直接軍事攻台或表示將會軍事攻台，也就說明台北的「兩國論」與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底線尚有距離，儘管有關的距離可能相當小。事實上，在「兩國論」發表後約一個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便曾作出了如下評論：大陸觀察到台灣沒有因應「兩國論」而修憲，也沒有修法，而李登輝的言論並沒有法律依據，「兩國論」是一個「廢案」，遲早要束之高閣。²⁹若然我們不認為這是北京面對台北的「兩國論」無計可施下自設的下台之階，錢氏有關的評論應多少透露出北京在「兩國論」乃至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的底線。

如果說北京現階段的「武嚇」行動，其著重點仍在於「防獨」而多於「促統」，是基於它認為「一九七二架構」的「一個中國」原則支柱受到台北的挑戰後的自然回應，那麼它的目的應該最少有三：

（一）阻止台北進一步單方面尋求完全脫離於中國大陸的客觀（法理的）國家地位。

（二）迫使台北就兩岸的政治分歧早日進行政治談判。

(三) 利用兩岸的可能軍事衝突迫使美國及其他世界強權不要支持乃至反對台灣任何關於尋求客觀國家地位的行動。

對於上述的目的，北京的「武嚇」行動可以有如下三種可能結果：

(一) 台北如北京的預期，在「武嚇」下先放棄或暫緩客觀國家地位的追求，甚至接受與北京進行政治談判或對話，以緩和兩岸關係的緊張。

(二) 台北不理會北京的「武嚇」，繼續追求其客觀國家地位，但不獲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支持。

(三) 台北不理會北京的「武嚇」，繼續追求其客觀國家地位，並獲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支持。

以目前的形勢看，第一種可能性發生的機會較大。在台北推出「兩國論」後，美國國務院隨即公開重申華盛頓對台的「三不」政策（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和不支持台灣加入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並強調其對華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變。³⁰ 其後美國總統克林頓更主動致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強調美國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定承諾並沒有改變。³¹ 另一方面，為了表示對台灣單方面提出「兩國論」的不滿，美國不僅要求台北對「兩國論」作出澄清，而且刻意降低正在台北舉行的「次長級經濟對話會議」的層級，取消了原訂美方代表團拜會行政院院長蕭萬長等高層人員的行程安排。³² 在北京和華盛頓的雙重壓力下，台北在七月下旬開始調整其「兩國論」立場。七月底，執政國民黨中常會一致議決不會就「兩國論」進行修憲和修法。³³ 八月初，陸委會發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說帖，表示希望兩岸回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³⁴ 台北的有關行動雖未必能令北京完全滿意，

但無疑有助暫時降低兩岸的緊張關係。事實上，在同年八月中以後，北京對台的「文攻武嚇」，已有轉趨和緩的跡象。³⁵

然而，若從較長遠的時程看，第二種可能性發生的機會也不能低估，尤其是在兩岸關係重新取得一段時間的和緩之後，因為台灣的新興政治現實及自主意識已使得它很難接受以模糊未定的身份與北京進行政治談判，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為了避免直接挑戰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對台灣追求客觀國家地位行動應不會公開支持。「兩國論」引爆了兩岸關係危機後，美國對台灣近年每年一次推動進入聯合國案的訴求，打破過去不介入、不發言的慣例，直言反對台灣加入，並重申「一個中國」原則；英國、義大利、法國、俄國等也公開作出相同的反對，足以反映這一點。³⁶

如果不久的將來真的出現上述第二種情況，北京會否果決地採取武力攻台以為反制呢？迄今為止，北京的態度仍然相當模糊：它只是不斷重申，其採取對台動武的前提是台獨或外國干預。但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追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甚至推動北京不欲看見、且公開反對的修憲修法以為因應，是否等同台獨呢？同樣模糊的是美國對北京若然採取軍事攻台時的可能反應：美國只表示北京任何對台的軍事行動均會在美國產生嚴重後果。³⁷ 這嚴重後果是否包括美國軍事協防台灣？

上述中美兩國在對台動武問題上的模糊立場正是「一九七二架構」面臨解體之際最危險也最不能確定的地方：當「武嚇」無法迫使台灣放棄客觀國家地位的尋求之後，北京會否在民族主義、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的三方考慮下，判定已無路可退而不避美國的可能軍事介入，選擇直接軍事攻台之途？

結語

「一九七二架構」的鬆動解體催生出台海一場圍繞於「統」與「獨」的政治豪賭：台北極欲跳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先爭取到台灣的客觀國家地位，然後才與北京談判未來兩岸關係的終極安排；北京則認定這是台獨的追求而以「武嚇」的方式迫使台灣重回「一九七二架構」中去。北京的「武嚇」又同時使對台海安全有所承諾的美國面對被迫捲進兩岸可能出現的軍事衝突之中。

說這是一場政治豪賭，因為我們無法準確預知台北的客觀國家地位追求會否被北京的「武嚇」嚇倒而在北京所詮釋的「一個中國」底線前停下來；我們也無法清楚掌握北京的「一個中國」底線為何；我們更無法肯定若然北京的「武嚇」無法迫使台北就範時會否斷然對台採取直接軍事行動；若然會，美國又是否會介入；而若然美國介入，介入的形式為何。

從任何角度看，這樣的一場政治豪賭牽涉的風險極高，而一旦博弈失敗而釀成台海戰爭，各方所可能付出的代價更是無法想像。「因此，在處理北京與台北關係時，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戰略思考上避開武力解決。」³⁸

要在戰略思考上避開武力解決兩岸關係問題，兩岸雙方也許必須正視彼此的需要，並在二者之間尋求交集和妥協。一方面，對於北京來說，它必須明白和尊重到在新興民主政治現實下台北對一個客觀的自主性政治地位的強烈渴望，並尋求以更寬廣的「一個中國」詮釋，給予台灣的政治自主地位要求某種制度性共存的形式加以包容；另一方面，對於台北來說，它必須理解和體諒到北京維繫「一個中國」的多重考慮，同時爭取某種聯合的方式以安其心、息其疑。在九五

／九六台海危機爆發之後，美國似乎已強烈意識到兩岸妥協的必要性，否則美國將會處於極不利的被動位置，隨時有被捲入兩岸的可能軍事衝突之中，因此自九八年初之後，不斷鼓勵兩岸展開積極對話，甚至透過不同管道，希望兩岸尋求訂立一個為期五十年的具體「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的可能性，藉此根本地達到穩定兩岸關係的目的。³⁹ 從「兩國論」引發的兩岸新一輪緊張看，美國的憂慮並非毫無根據；相反，它確實反映出「一九七二架構」已無法處理新浮現的兩岸現實和國際現實。當然，在當前兩岸互信仍相當缺乏的情況下，奢談「中程協議」未免不切實際，但各走極端、互不相讓顯然也決不可能導出新的和平架構。說到底，任何和平架構均預設了各方的溝通和妥協。就這一點而言，美國建議的「中程協議」，也許確是兩岸今後溝通妥協的一個方向，儘管協議的形式和內容，仍有待雙方談判決定。

註釋

1. 對於有關的言論，可參看《亞洲週刊》，1999年8月16日，頁28-37。
2. Shulong Chu, "National Unity,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a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36 (July 1996), pp. 98-102; Ming Zhang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A Triad of Another Ki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Japa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 11.
3. Timothy Ka-ying W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s Foreign Policy*,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pp. 4-6.

4. 見〈江澤民與沈君山的三次談話〉，《九十年代》，1996年8月總319期，頁106。
5. Andrew J. Nathan, "China's Goals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hina Journal*, No. 36 (July 1996), pp. 87-93.
6.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p. 17.
7. 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憬藝企業有限公司，1997，頁188-89。
8. James C. Hsiung, "China in the Postnuclear World," in James C. Hsiung (ed.), *Asia 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Polit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3, p. 88.
9. 吳國光，〈試析中國的東亞安全戰略〉，載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編，《廿一世紀的中國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1999，頁113-16。
10. 關於這三份文件的詳細內容，可參看 James S. C. Hu, *The Crucial Decad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aipei: Sino-American Publishing Co., Ltd., 1987.
11. Martin L. Lasater, "Taiwan'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Thomas Robinson (ed.),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1, p. 92.
12. 中美一九八二年共同發表的聯合公報，便反映出北京在這方面的努力，並取得美國某個程度的讓步。在聯合公報中，美國政府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13.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pp. 47-48; Bernstein and Munro, 1998, p. 38.
14. 對於這兩個對台動武前提，北京幾乎在每個對台政策說明場合均有重申，絕不含糊。參看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編，《中國台灣問題》，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8。
15. Zhang and Montaperto, 1999, p. 17.
16. 陳德昇，《兩岸政經互動》，台北：永業出版社，頁11。
17. Timothy Ka-ying Wong, "The Impact of State Development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Vol. 21, No. 1 (1997), p. 182.
18. Timothy Ka-ying Wong and Milan Tung-wen Sun,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Experience of Subjectivity in Taiwa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4, No. 2 (1998), pp. 247-72.
19. Timothy Ka-ying Wong, 1997, pp. 186-87.
20. Timothy Ka-ying Wong,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mpromise: A Historical-structural Account of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1994," in Chi-kin Lo et al. (eds.), *China Review 1995*,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15-4.16.
21. 辛旗，〈兩岸關係僵局之下的理性思考〉，《聯合報》，1995年7月25、26日。
22. 對於北京的「武嚇」，美國也明顯感到事態嚴重，故此才有九七年和九八年兩次中美峰會出現，中美兩國並因此達成了朝向「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的方向發展。對北京而言，這多少是「武嚇」的重要成就之一。
23. 《文匯報》，1999年10月2日。
24. *Times* (UK)，1999年10月18日。

「一九七二架構」的鬆動解體與 北京的對策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北京的對台政策。出於民族主義、政權穩定和國家安全的考慮，北京的對台政策相當一貫地以統一台灣為其基本訴求。不過，受到更高戰略需要的驅動，北京與華盛頓在七十年代取得相互的妥協，一個過渡性台海和平架構——「一九七二架構」——於焉誕生。這架構建基於兩個當時中美台三方均能暫時接受的原則：「一個中國」原則與和平原則，並成為北京七十年代以後和平統一台灣的政策框架。其後由於兩岸關係及國際政治的一系列變遷，有關的架構開始面對不斷上升的調整壓力。當中最具挑戰性的當為八十年代中以後台灣的急速民主化，後者使台灣對追求分離於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自主性／獨立的欲望日益高漲。而北京則視此追求為台北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背棄，因此以「武嚇」作為回應，從而重燃了兩岸的戰爭遊戲，甚至有將美國捲入的可能，因為華盛頓對台有安全承諾。結果是不僅「一九七二架構」的和平原則受到威脅，整個和平架構也被推向解體的邊緣。本文認為，有鑒於「一九七二架構」已無法應付新的兩岸現實，北京與台北必須尋求新的妥協架構，穩定兩岸關係，以避免兩岸走向戰爭。

25. 《中時電子報》，1999年10月19日。
26. 《文匯報》，2000年1月2日。
27. *The New York Times*，1999年9月12日。
28. 同註26。
29. 《中時電子報》，1999年8月17日。
30. 《中時電子報》，1999年7月15日。
31. 《中時電子報》，1999年7月19日。
32. 《中時電子報》，1999年7月21日。
33. 《中時電子報》，1999年7月28日。
34. 《中時電子報》，1999年8月2日。
35. 《中時電子報》，1999年8月18日。
36. 見《中時電子報》社論，1999年9月18日。
37. 同註27。
38. Alexander Chieh-cheng Huang, "Taiwan's View of Military Balance and the Challenge it Presents," in James R. Lilley and Chuck Downs (eds.),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93.
39. 關於美國官、學界方面對「中程協議」的一些具體建議，可參看羅致政，〈台灣海峽的危機穩定〉，載民主進步黨中國事務部編，1999，頁183。

The Dissolution of the “1972 Framework” and Beijing’s Coping Strategy

Timothy Ka-ying Wo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Beijing’s policy towards Taiwan in recent years. It argues that Beijing has been consistent in its insistence on reclaiming Taiwan, which is grounded upon considerations of nationalism,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However, driven by higher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compromised on a transitional peace framework in the 1970s — the “1972 framework” — for managing the politically unsettled Taiwan issue. The framework was constructed on the “one China” and the peace principles shared by China, the US and Taiwan. Yet, the framework later began to face mounting pressure for change as a result of a series of developments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mong these developments, the most challenging one came from Taiwan’s rapid democratization after the mid-1980s, which unleashed a strong desire among the Taiwanese to seek Taiwan’s political autonomy/independence *vis-à-vis* the PRC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eijing perceived such endeavour to be a departure from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therefore, responded to it with “military threats,” thereby igniting some kind of war-game gambling across the strait involving also the US, which had a commitment to Taiwan’s security. The peace principle of the “1972 framework” was also threatened and the entire framework was thus pushed towards total dissolution.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Beijing and Taipei should compromise and negotiate a new framework to settle their conflict.